

公平竞争与企业生产率：配置优化还是竞争逃离？

张敏敏¹，张国琰²

(1.泰山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2.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及歧视性干预造成了竞争的缺失和竞争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再规制，是竞争政策的具体化，可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受冲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制度推行逐渐深化。这一正向影响在低初始生产率及国有企业等低效率企业中尤为显著，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显著提升了市场主体而非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以致竞争逃离效应显著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不足。而抑制企业寻租活动、破除地方保护和规制行政垄断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进而激发低效率企业竞争逃离效应的重要渠道机制。研究结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地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公平竞争；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应；竞争逃离效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3)6—0102—13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而提升生产率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企业生产率反映了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是企业技术升级、产品质量提升、管理模式改进和企业结构升级等的综合体现，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是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Syverson(2011)指出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取决于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其中外部环境方面，根据王小鲁等(2017)的企业经营环境指数调查报告，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企业外部营商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政府过度干预和选择性干预、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通过管制限制竞争等使不同类型企业面临的政策待遇、行政干预、金融服务、法治环境等存在明显差异，造成了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行业歧视、地域歧视等非公平竞争格局，导致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资源型行业及对政府过度依赖的高行政垄断性行业倾斜，既保护了企业低效率，还会恶化非国有企业及行政垄断行业内处于市场弱势地位企业的处境，制约企业效率提升。其根源是政府按所有制、行业、地区等对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导致企业间缺乏公平竞争(刘志彪，2021)。

有效促进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是提升我国企业生产率的重要着力点。公平竞争理念具体化为政策便是竞争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于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公平竞争。而竞争政策可进一步具体化为旨在禁止企业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和旨在规制政府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平新乔，2022)。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马兆良和许博强(2023)以《反垄断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论证了竞争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但鲜有文献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研究竞争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政府干预是导致我国企业间公平竞争缺失进而生产效率低下的关键因素，2016年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重点关注政府行为是否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再规制(孙晋，2021)，能够防止政府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将政府主导型规制模式转变为市场回应型模式。根据叶光亮等(2022)的研究，竞争政策可以同时兼顾提升市场竞争效率和分配效率两项目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竞争政策的具体化，从要素资源 and 市场主体两个层面把控经济政策可能产生的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强调要素资源分配和企业参与市场的公平性。理论上，要素资源配置公平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流向更高效率的企业，并进一步提高此类企业的生产率；而企业公平参与市场则

收稿日期：2023-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技术变迁的动力、机制与政策研究”(19ZDA047)

作者简介：张敏敏，经济学博士，泰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张国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

可以提高市场竞争性,刺激承受更大压力的低效率企业提高生产率以逃离竞争。那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具体实施能否发挥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渠道机制是什么?有必要结合理论和审查制度的具体实施进行深入分析。

与上述问题联系较为紧密的一组文献是关于竞争与企业生产率关联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同市场竞争是推动企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力量(Holmes and Schmitz, 2010; 刘建翠, 2022),推进市场化进程(阎大颖和李磊, 2014)、进出口竞争(黄漓江, 2020)、减少行政垄断(刘志强和戚建梅, 2014)等均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关联产业的竞争增强,例如服务市场(Fernandes and Paunov, 2012)、银行业(蔡卫星, 2019)等的竞争加剧均能够对企业生产率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但也有研究支持了熊彼特假说,即垄断租金可以诱导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生产率,而竞争因增加了模仿的便利性(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提高商品间的替代性减少垄断租金(Caballero and Jaffe, 1993)等对企业研发和生产率增长造成破坏性影响(Aghion and Howitt, 1992)。部分学者通过更为细致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竞争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生产率有异质性影响(简泽和段永瑞, 2012),进而引起了生产率的跨企业分布演变。

如上所述,既有研究普遍基于企业间竞争强度考察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鲜有文献涉及企业间竞争的公平性。部分研究从侧面论及了制度公平的重要性,如卢现祥和贺芃斐(2021)发现产权保护公平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刘斌和潘彤(2022)则发现地方政府创新驱动在市场体系更加公平高效的南方地区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曾宪奎(2019)重点对“竞争中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认为竞争中性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推动整个产业生产率提升。上述研究虽触及公平竞争,但均可视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而非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而且也未就公平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展开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与规制政府行为相关的既有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是基于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考察政府简政放权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政府简政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交易费用(王永进和冯笑, 2018)、增加新企业进入威胁继而激励企业降低管理成本(郭小年和邵宜航, 2021)和提高创新能力(杨攻研等, 2021)等提高生产率。可以发现其研究重点仍然在于简政放权带来的竞争激励效应,对公平性的讨论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长期以来学界和业界普遍强调竞争的重要性,近年来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的公平性问题才越发凸显;另一方面,如何衡量竞争的公平性也是制约相关研究深入推进的重要因素。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为考察竞争的公平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场景。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①不同于既有研究侧重竞争强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强调公平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补充了既有文献研究视角的缺失;②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既合理规避了直接且全面衡量企业竞争公平性的难题,又有效避免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实证研究结论更加真实可靠;③本文关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的讨论,以及对两种效应的识别和相关影响机制分析,既丰富了关于企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也从实践角度明晰了公平竞争政策影响企业效率的路径机制;④研究结论及时呼应了当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及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的迫切要求,为破除阻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及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提供了学理支持和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公平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方式(Adams, 1965),而人的利益实现方式由利益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构成,本文探讨的公平竞争属于利益生产方式的范畴。公平的利益生产方式体现在生产利益的资料如何分配及利益的生产效率高低上(冯必扬, 2007)。市场竞争机制是公平的利益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市场机制可以保证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产生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实现按效率进行初次分配;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带来的竞争逃离效应会推动和迫使经济主体进行合理决策、不断创新。但历史实践表明市场竞争过程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自发形成的“自然秩序”,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层面的低效率问题需要依靠政府解决。干预主义的竞争理论更是直接否认古典利己主义的自然和谐,寻求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利益的人为一致性”。政府干预对市场失灵形成约束,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二元配置格局,即市场以价格机制启动竞争机制,通过动态的竞争过程形成资源配置过程,而缺乏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引导的政府干预则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同时还因其强制性和缺乏灵活性加剧资源配置扭曲,弱化竞争的优胜

劣汰机制,造成政府干预层面的低效率,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同样应受到约束。德国弗莱堡学派强调政府干预必须面向维护经济秩序,必须是系统性而非选择性的,目的是为了竞争发挥作用。可竞争市场理论也强调国家干预的主要任务是最大可能地消除市场限制,保证市场的可竞争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公平竞争政策的具体化,其底层逻辑仍为市场竞争机制,竞争强调了市场的核心地位,公平则明确了政府干预的定位。市场失灵引入了政府规制,政府规制的“失灵”则需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其进行再规制,要求政府干预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则(戚聿东和李颖,2018),使企业受到相同规则和宽严程度相当的规制,不使任何市场主体获得不合理的竞争优势。具体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调市场竞争性及竞争的公平性,破除妨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垄断障碍,着力于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叶光亮等,2022),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

(一)优化资源配置效应

资源错配是造成企业生产率损失的重要原因。Hsieh和Klenow(2009)指出如果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达到美国水平,可以使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30%~50%。Song和Wu(2015)则发现中国的资本要素错配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大约为20%。资源错配可分为地区间、行业间、行业内及企业层面的错配(叶初升等,2022)。造成资源错配的原因与企业、市场和政府三方面因素有关,企业方面,包括生产技术的调整成本、信息摩擦(Restuccia and Rogerson, 2017)及投资调整成本(David and Venkateswaran, 2019)等;市场方面,包括要素流动障碍(Dai and Cheng, 2019)、产业链垄断(王永进和刘灿雷, 2016)、产业结构(乌云图等, 2023)、金融摩擦异质性(林东杰等, 2022)等;政府干预是我国资源错配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为,行政垄断(靳来群等, 2015)、财政分权制度与晋升激励影响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竞争和引资竞争造成的地区资源错配(刘寒波等, 2022)、政府偏向性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对部分行业过度偏好(姬超和李艳丰, 2023)、地方政府对部分低效率企业的投资支持(吕鑫等, 2022)等。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条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从三方面减少资源错配,第一,确立了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准,强调禁止对外地或进口商品、劳务及经营者的歧视和排斥。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和降低市场分割,提升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配置效率,促进区域产业分工降低资源错配(袁胜超和吕翠翠, 2022)。第二,禁止违法给予部分企业优惠等偏向性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的行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保证经济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有效率地配置。第三,禁止行政垄断,同时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减少了对低效率行政垄断企业的保护(戚聿东和郝越, 2022)。如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深入推行可以通过提升要素资源在地区、行业及市场主体间的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生产率。

但是,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异质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意味着经济资源不断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由不具比较优势的企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转移,企业整体生产率不断提升。但是,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也拉大了企业间生产率差距,因为在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中,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不断实现技术升级和规模扩张,并进一步提高生产率(Lileeva and Trefler, 2010; 简泽等, 2017)。而对于初始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公平竞争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具有破坏性功能,要素资源不断流出造成企业投资受限、规模收缩,企业无法在生产经营中提升生产率,以致盈利下降、亏损甚至退出市场。

(二)竞争逃离效应

高进入壁垒会影响企业更替率,无法形成竞争压力驱动企业加大高投入、高风险的研发创新活动,造成企业“创新惰性”。而且竞争不充分导致市场需求信息不完全,企业难以及时调整自身发展方向与竞争策略,造成生产率停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条例对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的规制极大地提高了行业和地区竞争的公平性。此外,实施条例还明确规定了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禁止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设置审批程序,提高了市场准入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透明度(戚聿东和郝越, 2022),降低潜在竞争者的沉没成本,提高其进入退出市场的便利度,加快了市场上的企业更替,实现企业优胜劣汰,保证市场的竞争性。

生存者的利益保障是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能够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企业在竞争压

力下才有动力加快模仿创新提高生产率(Aghion et al, 2015)。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提升生产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更高的利润,竞争有序的市场可以保证创新者获得所有的剩余索取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调市场主体竞争的公平性,大力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充分且公平地竞争,给企业获取效率改善收益提供了制度保证。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利益保障,又提高了市场的竞争程度,带来显著的竞争逃离效应。斯密-阿罗传统强调的竞争激发的竞争逃离效应是指竞争带来的生存威胁和分享利润的欲望会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多方向创新、累积创新及创新租的保护动机是竞争逃离效应的三个来源(Dinopoulos and Syropoulos, 2007),竞争逃离效应体现的是企业对既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最大可能地消除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形成的实际竞争和潜在竞争压力可以规范在位企业的行为,市场竞争又可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及效率提升(张杰等, 2014; 阮敏和简泽, 2020)。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实施能够降低市场进出壁垒,提高市场竞争程度。一方面,企业进入退出自由,新企业进入必然降低在位企业的利润率(Janvry et al, 2012),企业想获取超额利润,就需要进行自主创新。如此,可以形成创新产生利润—模仿竞争分享利润—再创新产生利润的动态竞争良性循环,使企业生产率在连续创新过程中持续提升;另一方面,潜在竞争压力也会迫使在位企业为“逃离竞争”进行适应性调整,通过加快学习模仿和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等提高企业生产率,以维持企业盈利和市场份额(Bartelsman et al, 2013; 张文魁, 2021)。

明显地,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存在异质性。康岑巴赫的最佳竞争理论认为处于被动模仿地位的低效率企业受到的生存威胁越大,其反应速度就越快,反应行为也就越强烈,竞争逃离效应会发挥支配性作用(简泽和段永瑞, 2012),驱动企业通过适应性调整改进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企业生产率。而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竞争加剧造成的租金消散效应起主导作用,反而有可能阻碍此类企业的生产率增长(Romer, 1990)。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H1);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作用体现为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具体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尤其提高了初始高效率企业的生产效率(H2);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作用体现为竞争逃离效应,具体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尤其提高了承受更大竞争压力的初始低效率企业的生产效率(H3)。

三、研究设计

(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冲击企业界定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从2016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要求2019年底实现部、省、市、县四级政府公平竞争审查的全覆盖。本文以2016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考察公平竞争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未采取试点,不存在天然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本文综合考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企业行政垄断因素对样本进行分组,从政府规制和企业特征两方面保证对照组企业尽可能不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影响。具体地,首先,考虑到审查制度实施前后的样本平衡性,选择2012—2020年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然后,计算2012—2015年各地市场化总指数^①平均值,根据企业注册地所处地理区位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初步划分,选取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上三分位数省市的企业,包括注册地位于江苏、天津、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北京、重庆、安徽10个省市的企业。最后,参考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对行政垄断行业的划分标准,选取上述样本中的非行政垄断行业企业作为对照组初始样本,将处于其他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初始样本。

在此基础上删除:①special treatment(ST)、particular transfer(PT)、ST*企业;②金融行业企业;③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④年度行业观测值小于10的样本;⑤政策出台当年即2016年的样本;⑥仅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之前(2016年之前)或之后(2016年之后)有观测值的企业样本,即企业在审查制度出台前后至少各有一年观测值。基于此样本,借鉴谢申祥等(2021)提出的倾向得分值序列间整体匹配法对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以保证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满足DID模型要求的随机性及平行趋势假设,最终得到匹配后样本观测值14553个,其中处理组为5389个观测值,对照组9164个观测值。

① 市场化总指数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二)构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处理效应 PSM-DID 模型

本文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代理变量。 TFP 刻画了企业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它通常被解释为总产出中不能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部分。 TFP 不仅衡量了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还反映了企业生产中管理运营能力、公司治理能力及资源配置能力等诸多不能直接量化的投入要素的效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生产率的合理变量。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的研究,采用 OP 法和 LP 法两种半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便更好地解决模型估计过程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

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PSM-DID 模型(1)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处理效应。如果系数 β 显著为正,则验证了假设 1,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

$$TFP_{it} = \alpha_0 + \beta Policy_{it} + \thet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Policy$ 为关键解释变量,如果企业在 2016 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受到冲击则赋值为 1,其他为 0。即处理组样本在 2017—2020 年 $Policy$ 赋值为 1,其他为 0,系数 β 为政策处理效应。控制变量向量 X ,包括企业规模($Scal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Top10$)、固定资产周转率(Tat)、自由现金流(FCF)、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g$)、企业资产专用性(Spe)等企业特征变量,行业内企业数量($Number$)、企业所属行业资产可逆性(Rev)等行业特征变量。其中借鉴 Berger 等(1996)采用企业资产退出价值衡量资产专用性, $Spe=(\text{现金和有价证券}+0.715\times\text{应收账款}+0.547\times\text{存货}+0.535\times\text{固定资产})/\text{总资产}$ 。借鉴 Kim 和 Kung(2017)的研究,基于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某行业产品在不用行业之间的使用广度,作为行业资产可逆性(Rev)的代理变量。此外,还控制了宏观经济变量地区经济增长率($GDPg$)。模型中控制了个体效应 μ_i 和年度效应 λ_t ; ε_{it} 为误差项。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1。

表 1 相关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简称	定义
企业生产率	TFP_LP	采用 LP 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_OP	采用 OP 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规模	$Scale$	$\ln(\text{年末资产总额})$
企业年龄	Age	企业上市年限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股权集中度	$Top10$	企业前 10 大股东持股比例
固定资产周转率	Tat	$\ln(\text{营业收入}/\text{固定资产平均净值})$
自由现金流	FCF	企业自由现金流/本年总资产均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	$Saleg$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资产专用性	Spe	企业资产退出价值
行业内企业数量	$Number$	$\ln(\text{东、中、西各地区各年度行业内企业数量})$
行业资产可逆性	Rev	某行业产品在不用行业之间的使用广度
地区经济增长率	$GDPg$	各省、直辖市地区 GDP 同比增长率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前的样本,分年度对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 5% 水平下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每个年度样本都通过了平衡性检验,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相似,匹配效果较好。基于匹配后的样本,首先按照处理组和对照组分类,然后按照政策冲击前后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后,处理组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都小于对照组企业,说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的生产率普遍低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竞争性企业。比较审查制度出台前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制度出台后,处理组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有所提升,但对照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_LP 有轻微下降, TFP_OP 的均值虽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远小于处理组。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看,与对照组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后,处理组企业的生产率确实有明显提升,但这种变化是否是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带来的政策效应,还需要借助 DID 模型进一步分析。

表 2 处理组与对照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处理组						对照组					
	2012—2015 年			2017—2020 年			2012—2015 年			2017—2020 年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TFP_LP	5.323	1.363	5.228	5.341	1.393	5.245	5.483	1.470	5.294	5.430	1.492	5.228
TFP_OP	5.618	1.134	5.535	5.700	1.158	5.641	5.727	1.208	5.572	5.769	1.224	5.623
Age	16.439	5.137	16.206	21.263	5.140	21.229	15.093	5.337	14.885	19.764	5.331	19.624
$Scale$	22.096	1.246	21.907	22.597	1.264	22.525	21.843	1.127	21.717	22.463	1.156	22.343
Lev	0.464	0.216	0.460	0.442	0.200	0.463	0.398	0.208	0.385	0.422	0.192	0.414
$Top10$	0.558	0.156	0.560	0.556	0.147	0.553	0.586	0.147	0.600	0.546	0.139	0.544
Tat	0.801	0.995	0.779	0.912	1.080	0.875	1.334	1.057	1.202	1.455	1.115	1.314
FCF	-0.007	0.162	0.018	0.007	0.133	0.018	-0.005	0.154	0.021	0.005	0.121	0.018
$Saleg$	0.129	0.482	0.053	0.162	0.482	0.079	0.163	0.406	0.100	0.146	0.389	0.094
Spe	0.465	0.116	0.470	0.432	0.117	0.442	0.498	0.122	0.496	0.433	0.121	0.441

续表

变量	处理组						对照组					
	2012—2015年			2017—2020年			2012—2015年			2017—2020年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i>Number</i>	4.038	0.783	4.143	4.202	0.869	4.263	4.234	0.735	4.394	4.470	0.778	4.564
<i>Rev</i>	0.329	0.072	0.327	0.320	0.070	0.317	0.321	0.066	0.324	0.316	0.065	0.314
<i>GDPg</i>	0.075	0.003	0.074	0.055	0.019	0.068	0.075	0.003	0.074	0.055	0.019	0.068
样本量	2619			2770			4374			479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处理效应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 DID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1)、列(2),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受审查制度冲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处理效应为 0.1034(0.0765)。即与未受审查制度冲击的企业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推行使受冲击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提升了 10.34%(7.65%)。

为估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处理效应,构建 $DID_{2017} \sim DID_{2020}$ 一系列哑变量替换之前的政策变量 *Policy*。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的 2017—2020 年期间,如果企业在某年受到审查制度实施的影响,相应年度的 *DID* 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构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处理效应模型(2)。

$$TFP_{it} = \alpha_0 + \sum_{t=2017}^{2020} \varphi_t DID_{it}^t + \thet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φ_t 为分期政策变量 DID^t 的系数,代表政策的分期处理效应。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 3 列(3)、(4),在两个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分期政策变量 $DID_{2017} \sim DID_{2020}$ 的系数在 5% 水平下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值呈现递增趋势,变量 $DID_{2019} \sim DID_{2020}$ 的系数明显大于 $DID_{2017} \sim DID_{2018}$ 的系数。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处理效应随着审查制度的推进而深化,制度出台初期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较小,但后期制度推行效果凸显。究其原因,第一,短时间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尚未建立起周密的实施标准、完善的审查操作流程及科学的审查评估方法,存在机制不完善和各地审查工作推进不平衡的问题(黄娟和喻玲,2020),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推动作用有限,随着时间推进,审查标准越趋于全面化、深度化、细则化,体系本身和外在实施的效果也越佳。第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自我审查机制是一种同体监督,在各项制度标准不完善的初期尤其难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进而削弱了政策效果。而随着制度标准的完善,监督机制才能逐渐发挥作用,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更大的促进效果。第三,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到市场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再到企业采取应对措施需要一定的政策反应期,而且从企业采取对策到生产率的明显提升也需要一定时间。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为保证 DID 模型结论的有效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LP} 、 TFP_{OP})的变化应不存在系统性差别,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把模型(2)中 *DID* 哑变量扩展至 2012—2020 年后重新回归,图 1 为根据回归结果绘制的 95% 置信区间下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审查制度实施前的 2012—2015 年 *DID* 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冲击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的全要素

表 3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效应模型(1)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TFP_{LP}	TFP_{OP}	TFP_{LP}	TFP_{OP}
<i>Policy</i>	0.1034*** (0.0364)	0.0765*** (0.0283)		
<i>DID</i> 2017			0.0697** (0.0344)	0.0530** (0.0266)
<i>DID</i> 2018			0.0941** (0.0382)	0.0683** (0.0297)
<i>DID</i> 2019			0.1244*** (0.0408)	0.0913*** (0.0319)
<i>DID</i> 2020			0.1269*** (0.0461)	0.0946*** (0.03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553	14553	14553	14553
组内 R^2	0.4368	0.4714	0.4369	0.4715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份和行业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

生产率变量的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异。而 2016 年审查制度出台后, *DID* 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逐年递增,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在审查制度出台后存在明显的拐点。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基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2. 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及自相关等问题影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并排除其他政策冲击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趋势变化的可能影响, 对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随机抽取处理组、随机设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的某一年作为政策出台时点, 重复 500 次回归模型(1), 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政策变量 *Policy* 的估计系数普遍集中在 0 值附近呈现正态分布, 5% 水平下系数几乎都不显著, 说明在虚构样本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_LP*、*TFP_OP* 没有产生实质影响。而且随机化回归结果中 *Policy* 的系数值均小于基准回归结果 (*Policy* 系数真实值及相应 *P* 值为图 2 中两条虚线的交点), 安慰剂检验通过。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采用局部线性匹配和一对一匹配计算个体企业的倾向匹配得分 ps_{it} , 并基于此得分进行值序列间匹配重新筛选对照组。

(2) 考虑极端事件冲击的影响。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为避免突发极端事件冲击企业生产率, 造成其变化趋势异常变动, 影响实证结论的有效性, 删除 2020 年的样本观测值。

(3) 更换对照组。考虑到对照组企业所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 市场化程度存在一定差异。选择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经济发展更快的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 6 省市作为对照组样本。模型(1)的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4, 变量 *Policy*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基本结论稳健。至此, 研究假设 H1 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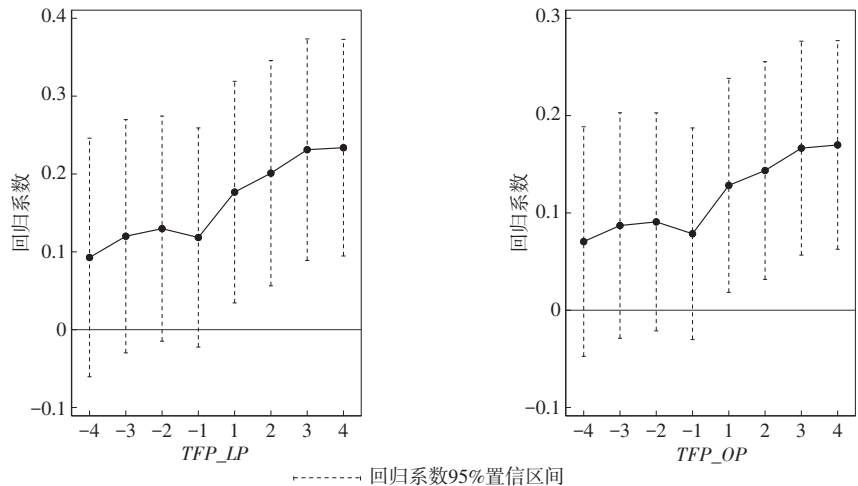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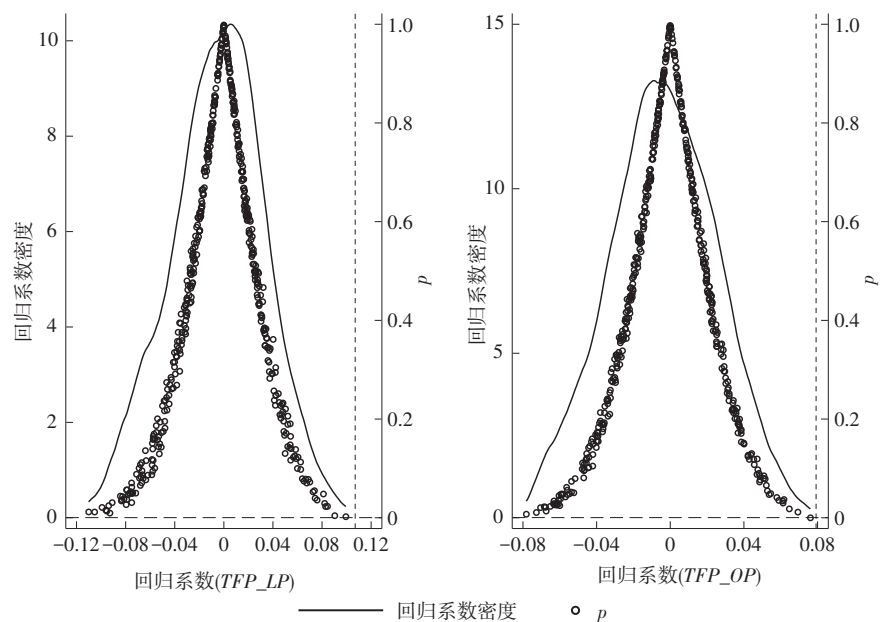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局部线性匹配		一对一匹配		考虑极端事件冲击		更换对照组	
	(1)	(2)	(3)	(4)	(5)	(6)	(7)	(8)
	<i>TFP_LP</i>	<i>TFP_OP</i>	<i>TFP_LP</i>	<i>TFP_OP</i>	<i>TFP_LP</i>	<i>TFP_OP</i>	<i>TFP_LP</i>	<i>TFP_OP</i>
<i>Policy</i>	0.1020*** (0.0372)	0.0756*** (0.0289)	0.1092*** (0.0365)	0.0812*** (0.0284)	0.1001*** (0.0350)	0.0738*** (0.0271)	0.1024** (0.0409)	0.0780** (0.03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084	14084	14384	14384	12680	12680	11389	11389
组内 R^2	0.4369	0.4711	0.4460	0.4815	0.4222	0.4568	0.4590	0.4953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省份和行业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政策效应识别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优化资源配置效应能够改善高效率企业的生产率,而竞争逃离效应则会更显著地作用于低效率企业。由此,通过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效率不同企业中的异质性表现,可以识别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效应机理。

以企业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2012—2015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作为初始生产率,按照均值将处理组样本分为高、低初始生产率两组。均值T检验表明,2016年之前,处理组企业中低初始生产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4.3577/4.8011)显著低于高初始生产率组(6.2907/6.4354)。模型(1)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5第1-4列,结果显示低初始生产率组中变量*Policy*的系数显著为正,但高初始生产率组中*Policy*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仅仅显著提升了初始生产率较低企业的生产率,对原本效率较高企业的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显著地表现为竞争逃离效应。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生产率较低企业在较大的竞争和生存压力下会更积极地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等提高生产率,但高生产率企业却不易受到竞争压力驱动。

典型地,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也存在明显的效率差异。均值T检验表明,处理组中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5.2136/5.4538)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5.7329/6.0946)。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长期在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市场准入和强制淘汰等方面被差别对待,政治庇护、竞争缺失及权力寻租性腐败等问题造成了国有企业生产率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的格局。分组回归结果见表5的列(5)~列(8),不同于张杰等(2014)基于1999—2007年工企数据得出的竞争只对非国有企业产生激励效应的研究结论,本文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推行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行给国有企业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激发竞争逃离效应,从而加快模仿、不断提升生产率以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显著提升了低初始生产率和国有企业等低效率企业的生产率,而这些企业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冲击下普遍承受了更大的竞争压力。这一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H3,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注重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激发低效率企业产生竞争逃离效应并提高生产效率,进而缩小了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但是,企业生产率的高低固然重要,但要素资源能够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问题(Hsieh and Klenow, 2009),显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尚存在不足,这也验证了当下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裹足不前的现状(叶卫平, 2021)。

表5 模型(1)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低初始生产率组		高初始生产率组		国有企业组		非国有企业组	
	(1)	(2)	(3)	(4)	(5)	(6)	(7)	(8)
	<i>TFP_LP</i>	<i>TFP_OP</i>	<i>TFP_LP</i>	<i>TFP_OP</i>	<i>TFP_LP</i>	<i>TFP_OP</i>	<i>TFP_LP</i>	<i>TFP_OP</i>
<i>Policy</i>	0.2061*** (0.0430)	0.1338*** (0.0345)	0.0048 (0.0473)	0.0215 (0.0362)	0.1405*** (0.0422)	0.1008*** (0.0330)	0.0705 (0.0483)	0.0543 (0.03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876	11876	11841	11841	11794	11794	11923	11923
组内R ²	0.4391	0.4721	0.4328	0.4656	0.4255	0.4584	0.4396	0.4740

注: *、**、***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份和行业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机制分析

进一步探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激发竞争逃离效应提升低效率企业生产率的具体作用机制。市场竞争压力是企业产生竞争逃离效应的动力源泉,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从以下机制提高了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尤其显著地增大了低效率企业的竞争压力。

(一)简政放权,抑制企业寻租活动

寻租能够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贴、投资机会、税收优惠和市场保护等经济利益(Cai et al, 2011)。市场机制不完善情况下,企业为获取关键资源延续竞争力,往往向支配资源的管制者进行寻租。但寻租成本是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被管制者施加的额外交易成本(Chen et al, 2011),一方面寻租成本作为非生产性支

出,会挤占企业研发资源,抑制企业创新(Akcigit et al, 2023);另一方面过高的政治关联带来资源诅咒效应(袁建国等, 2015),企业长期依靠政府补助和资源倾斜“苟活”,没有动力和能力进行技术改造,生产率下降。

制度越落后、政府对经济干预越严重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寻租意愿越强,寻租活动越频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改善政府服务、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法律保护等措施提高了设租风险,挤压企业的寻租空间,加大了长期依赖寻租活动获利的低效率企业的生存压力,迫使此类低效率企业转变发展模式,通过改善生产效率提高自身竞争力。此外,寻租活动的减少还可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调动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大创新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夏后学等, 2019)。

为验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抑制企业寻租活动提高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借鉴既有研究,构建中间机制模型(3)、模型(4)。

$$Intermediator_{it} = \alpha_0 + \rho_1 Policy_{it} + \thet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TFP_{it} = \alpha_0 + \rho_2 Intermediator_{it} + \thet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Intermediator$ 为中间机制变量,此处为企业寻租活动强度($Rent$),下文中替换为相应的中间机制变量,模型中均控制个体效应和年度效应。借鉴陈骏和徐捍军(2019)的研究估算企业的超额管理费用作为企业寻租活动强度 $Rent$ 的代理变量。

以变量 $Rent$ 为中间机制变量的模型(3)、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见表6,变量 $Policy$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显著抑制了受审查制度冲击企业的寻租活动。模型(4)按照处理组企业初始生产率高低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寻租活动的减少有效提升了低效率企业的生产率,而对高效率企业并没有显著影响。寻租空间的挤压使长期依赖寻租获益的低效率企业不得不转变发展模式提升生产效率,但对高效率企业并不能形成明显压力而影响其生产效率。所以抑制企业寻租活动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产生竞争逃离效应提高低效率企业生产率的重要渠道机制。

表6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抑制企业寻租活动($Rent$)中间机制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低初始生产率企业		高初始生产率企业	
	$Rent$	TFP_LP	TFP_OP	TFP_LP	TFP_OP
$Policy$	-0.0261*** (0.0063)				
$Rent$		-0.4729*** (0.1006)	-0.3774*** (0.0765)	-0.9834 (0.6251)	-0.6410 (0.62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553	2712	2712	2677	2677
组内 R^2	0.1020	0.5782	0.6024	0.4806	0.5102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份和行业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破除地方保护壁垒,规制行政垄断

政府及所属部门对市场主体的不正当干预会妨碍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地方保护壁垒扮演了对低效率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进行隐性补贴的角色(刘瑞明, 2012),同时也抑制了国有企业的效率提升(余永泽等, 2022);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造成行政垄断,并导致市场权力在竞争者之间长期分配不均。政治庇佑及竞争的缺失导致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损失,而且引致大量权力寻租性腐败,加剧其生产效率损失。此外,行政垄断还会滋生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分割等问题,进一步损害企业生产率。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令禁止地方保护、区域封锁,可以有效避免各地区、各部门搞区域化、差别化、弹性化的市场准入规则,减少市场分割,提高地区间市场主体间竞争的公平性。此外,公平的市场竞争过程可以充分揭示生产消费信息,有利于地方政府探索适合地方经济的产业发展方向,避免地区间产业同构现象,由此也减少了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同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对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禁止政府部门通过优惠政策、价格干预等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从源头上防范行政垄断。如此,竞争不再局限于部分市场区域和市场主体,竞争范围和竞争强度增大,以往受政府“关照”更多的国有企业首先遭受竞争冲击,陡然上升的竞争压力驱动其加快改革、加大研发投入、改善管理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参考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的研究,采用价格指数法^②测算各省份与其他省份间的市场分割指数 $Mseg$ 作为地方保护程度的代理变量。以 $Mseg$ 为中间变量的中间机制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表7),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显著降低了受冲击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市场分割程度的下降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② 出于统计口径一致性和数据连续性的考虑,选取食品类、纺织品类、化妆品类、书报杂志类、中西药品类、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服装鞋帽类、建筑建材类、饮料烟酒类、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类、家具类、交通通信类、燃料类、日用品类15类商品零售环比价格指数。

但对非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减少了地方保护壁垒,尤为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庇护,更加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刺激国有企业加快改善生产效率以维持市场地位。

参考刘小玄和张蕊(2014)的研究,以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作为各地行政垄断程度的代理变量 Am , Am 值越大,行政垄断程度越高。以 Am 作为中间机制变量回归模型(3)、模型(4),结果见表8, $Policy$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显著降低了受政策冲击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而 Am 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行政垄断程度的下降给国有企业造成的压力产生了竞争逃离效应,进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值得注意的是,破除地方保护壁垒和规制行政垄断降并没有带来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改善,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虽然通过规制政府行为提高了竞争的公平性,限制了资源向低效率企业的流动,但并没有产生显著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使资源充分流向高效率企业。究其原因在于要素资源的流动仍受到诸多限制,市场机制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发挥决定性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的歧视性干预是造成企业间公平竞争缺失进而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竞争政策的具体化,从公平竞争角度探讨竞争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动态竞争理论和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规制政府干预行为提高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的竞争性及竞争的公平性,可以产生“竞争逃离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进一步以2016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基于2012—2020年上市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①从平均处理效应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显著提高了受审查制度冲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②从动态处理效应看,随着审查标准、审查机制、操作流程等逐渐细化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处理效应不断深化。③基于异质性分析识别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效应机理,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尤为显著地提升了受冲击较严重、竞争压力较大的低初始生产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主要通过竞争逃离效应而非优化资源配置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重视市场主体间竞争的公平性,通过提升低效率企业的生产率,有效缩小了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但是对要素资源的公平竞争尚未形成明显改善,导致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不足。④机制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进而抑制企业寻租活动、破除地方保护壁垒和规制行政垄断等渠道机制增加低效率企业的竞争压力,进而激发竞争逃离效应提高其生产率。本文从规制政府行为提高竞争公平性的角度丰富了企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弥补了既有研究重视竞争强度而忽视竞争公平性、重视政府规制行为而忽视对政府规制行为再规制的不足。同时将公平理论和竞争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市场竞争机制→市场失灵→政府规制→政府失灵→再规制→公平竞争的逻辑理论体系,丰富了动态竞争理论的内涵和层次,并结合实践经验为公平竞争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破除阻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竞争逃离效应显著启示我们应持续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清理市场壁垒,放宽市场准入,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提高市场的可竞争性,进而发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功能,激励企业

表7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壁垒($Mseg$)
中间机制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Mseg$	TFP_LP	TFP_OP	TFP_LP	TFP_OP
$Policy$	-0.1548** (0.0626)				
$Mseg$		-0.0191** (0.0078)	-0.0148** (0.0058)	0.0048 (0.0051)	0.0036 (0.00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553	2630	2630	2759	2759
组内 R^2	0.4756	0.4372	0.4689	0.4942	0.5315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份和行业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8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制行政垄断(Am)
中间机制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Am	TFP_LP	TFP_OP	TFP_LP	TFP_OP
$Policy$	-0.0074*** (0.0011)				
Am		-2.0155*** (0.6683)	-1.5286*** (0.5139)	1.5417 (1.1369)	1.2400 (0.86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553	2630	2630	2759	2759
组内 R^2	0.1820	0.4488	0.4789	0.4944	0.5317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份和行业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

不断创新提高生产率。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不足则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仍处于较初级阶段,仅仅扩大了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机会,但并未保证其按照市场原则公平获取要素资源的权利。市场未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行政垄断型资源配置方式仍广泛存在,需要着力解决政府政策和行政干预厚此薄彼的问题。一方面,应加大对政府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等的审查力度,审查过程中要保持公平竞争审查机构的独立性,抵制利益主体的不当影响和干预,规避因同体监督导致的监督控制机制缺失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及企业制度和组织创新,消除行政性垄断,为各类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发展提供均等机会,确立其平等市场地位,并予以法律保护。

第三,政府简政放权、禁止权力部门设租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企业寻租活动,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励企业转变发展模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企业自主发展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政府减少干预而专注于提升服务水平,建设有为政府。

第四,破除地方保护壁垒可以驱动企业提高生产率,这一结论凸显了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启示我们一方面应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现存的妨碍建设统一开放市场的政策、规定和做法,尤其应妥善处理此前疫情期间各地管控封锁政策造成的地区沟通不畅问题;另一方面要树立整体竞争观,可由更高层级政府统一区域内市场竞争规则,协调区域市场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干预行为,逐渐实现由地方到区域,由区域到全国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

参考文献

- [1] 蔡卫星, 2019.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4): 39-55.
- [2] 陈骏, 徐捍军, 2019. 企业寻租如何影响盈余管理[J]. 中国工业经济, (12): 171-188.
- [3] 冯必扬, 2007. 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 郭小年, 邵宜航, 2021. 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J]. 财经研究, 47(8): 19-33.
- [5] 黄娟, 喻玲, 2020.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绩效的时空特征及与地方政府的因应[J]. 经济地理, 40(12): 40-47.
- [6] 黄漓江, 2020.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J]. 世界经济研究, (2): 19-32.
- [7] 姬超, 李艳丰, 2023. 政府规模扩张的资源错配效应: 理论和实证——基于我国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门槛分析[J]. 投资研究, 42(1): 41-51.
- [8] 简泽, 段永瑞, 2012. 企业异质性、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J]. 管理世界, 29(8): 15-29.
- [9] 简泽, 谭利萍, 吕大国, 等, 2017. 市场竞争的创造性、破坏性与技术升级[J]. 中国工业经济, (5): 16-34.
- [10] 靳来群, 林金忠, 丁诗诗, 2015. 行政垄断对所有制差异所致资源错配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4): 31-43.
- [11] 林东杰, 崔小勇, 龚六堂, 2022. 金融摩擦异质性、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J]. 经济研究, 57(1): 89-106.
- [12] 刘斌, 潘彤, 2022. 地方政府创新驱动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企业生产率视角的考察[J]. 财经研究, 48(2): 18-32.
- [13] 刘寒波, 牛晨, 刘江浩, 2022. “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资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湖南省“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检验[J]. 经济地理, 42(12): 33-41.
- [14] 刘建翠, 2022.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回顾与展望[J]. 技术经济, 41(1): 77-87.
- [15] 刘瑞明, 2012. 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 理论与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39(4): 21-32.
- [16] 刘小玄, 张蕊, 2014. 可竞争市场上的进入壁垒——非经济垄断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4): 71-83.
- [17] 刘志彪, 2021. 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 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J]. 学术月刊, 53(9): 49-56.
- [18] 刘志彪, 孔令池, 2021. 从分割走向整合: 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 中国工业经济, (8): 20-36.
- [19] 刘志强, 戚建梅, 2014. 地区行政垄断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7): 136-141.
- [20] 卢现祥, 贺芃斐, 2021. 产权保护公平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两期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J]. 江汉论坛, (9): 67-77.
- [21] 鲁晓东, 连玉君, 2012.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1999-2007[J]. 经济学(季刊), 11(2): 541-558.
- [22] 吕鑫, 付文林, 周瑞, 2022. 地方政府债务、行业关联与资源配置效率[J]. 财贸经济, 43(12): 49-64.
- [23] 马兆良, 许博强, 2023. 竞争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1(2): 144-157.
- [24] 平新乔, 2022. 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认识[J]. 经济动态, (11): 17-22.
- [25] 戚聿东, 郝越, 2022. 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J]. 南方经济, (8): 10-21.
- [26] 戚聿东, 李颖, 2018. 新经济与规制改革[J]. 中国工业经济, (3): 5-23.

- [27] 阮敏, 简泽, 2020. 国内市场竞争、全要素生产率与国际贸易[J]. 科研管理, 41(6): 109-118.
- [28] 孙晋, 2021. 公平竞争原则与政府规制变革[J]. 中国法学, (3): 186-207.
- [29] 王小鲁, 樊纲, 马光荣, 2017.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7年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30] 王彦超, 蒋亚含, 2020. 竞争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研究, (8): 137-152.
- [31] 王永进, 冯笑, 2018.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 24-42.
- [32] 王永进, 刘灿雷, 2016.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基于制造业数据的微观考察[J]. 管理世界, 33(6): 10-21.
- [33] 乌云图, 陶克涛, 彭俊超, 2023. 产业协同集聚、数字技术支持与资源错配[J]. 科研管理, 44(1): 125-135.
- [34] 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 2019.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54(4): 84-98.
- [35] 谢申祥, 范鹏飞, 苑阔渊, 2021. 传统PSM-DID模型的改进与应用[J]. 统计研究, 38(2): 146-160.
- [36] 阎大颖, 李磊, 2014. 市场化改革同步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J]. 产业经济研究, (5): 83-91, 103.
- [37] 杨攻研, 范琳琳, 胥鹏, 2021. “简政放权”与僵尸企业出清: 以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为例[J]. 经济评论, (1): 33-48.
- [38] 杨兴全, 张可欣, 2023.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J]. 财经研究, 49(1): 63-78.
- [39] 叶初升, 李承璋, 罗连发, 2022. 资源错配的多层次识别、分解与比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分析视角[J]. 社会科学战线, (3): 42-55.
- [40] 叶光亮, 程龙, 张晖, 2022. 竞争政策强化及产业政策转型影响市场效率的机理研究——兼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J]. 中国工业经济, (1): 74-92.
- [41] 叶卫平, 2021. 财政补贴、产业促进与公平竞争审查[J]. 交大法学, (4): 5-15.
- [42] 余泳泽, 胡山, 杨飞, 2022. 国内大循环的障碍: 区域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J]. 中国工业经济, (12): 108-126.
- [43] 袁建国, 后青松, 程晨, 2015. 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J]. 管理世界, 32(1): 139-155.
- [44] 袁胜超, 吕翠翠, 2022. 地方政府合作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J]. 当代财经, 454(9): 3-14.
- [45] 曾宪奎, 2019. 竞争中性和生产效率提升与国有企业改革[J]. 理论学刊, (4): 88-94.
- [46] 张杰, 郑文平, 翟福昕, 2014. 竞争如何影响创新: 中国情景的新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11): 56-68.
- [47] 张文魁, 2021. 我国企业发展政策的历史逻辑与未来取向[J]. 管理世界, 37(12): 15-24.
- [48]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4): 267-299.
- [49] AGHION P, CAI J, DEWATRIPONT M, et al. 2015.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4): 1-32.
- [50] AGHION P, HOWITT P,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 Econometrica, 60(2): 323-351.
- [51] AKCIGIT U, BASLANDZE S, LOTTI F, 2023. 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J]. Econometrica, 91(2): 529-564.
- [52] BARTELSMAN E, HALTIWANGER J, SCARPETTA S, 2013.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allocation and sele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 305-334.
- [53] BERGER P G, OFEK E, SWARY I, 1996. Investor valuation of the abandonment op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2(2): 259-287.
- [54] CABALLERO R J, JAFFE A B, 1993. How high are the giants' shoulder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8: 15-74.
- [55] CAI H, FANG H, XU L C, 2011.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J].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54(1): 55-78.
- [56] CHEN C J P, LI Z, SU X, et al, 2011. Rent-seeking incentives,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Chinese evidenc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Amsterdam, Netherlands), 17(2): 229-243.
- [57] DAI X, CHENG L, 2019. Aggregate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factor misallocation across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J]. Economic Systems, 43(1): 30-41.
- [58] DAVID J M, VENKATESWARAN V, 2019. The sources of capital misalloc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7): 2531-2567.
- [59] DIPOPOULOS E, SYROPOULOS C, 2007. Rent protection as a barrier to innovation and growth[J]. Economic Theory, 32(2): 309-332.
- [60] FERNANDES A M, PAUNOV C, 201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Evidence for Chil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2): 305-321.
- [61] GROSSMAN G M, HELPMAN E, 1991. 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2): 557-586.

- [62] HOLMES T J, SCHMITZ J A, 2010.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A review of evidence[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1): 619-642.
- [63] HSIEH C, KLE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 [64] JANVRY A D, FREDERICO F, ELISABETH S, 2012. Local electoral incentives and decentralized program performanc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3): 672-685.
- [65] KIM H, KUNG H, 2017. The asset redeployability channel: How uncertainty affects corporate investment[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0(1): 245-280.
- [66] LILEEVA A, TREFLER D, 2010. 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raises plant-level productivity...for some plan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3): 1051-1099.
- [67] RESTUCCIA D, ROGERSON R, 2017. The causes and costs of misalloc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3): 151-174.
- [68] 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S71-S102.
- [69] SONG Z, WU G L, 2015. Identifying capital misallocation[J]. Working Paper, URL: https://personal.ntu.edu.sg/guiying.wu/SW_Misallocation_201501.pdf.
- [70] SYVERSON C, 2011. What determines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2): 326-365.

Fair Competition and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or Escaping Competition?

Zhang Minmin¹, Zhang Guoya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00, Shandong,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s excessive and discriminatory intervention in enterprises not only leads to insufficient competition but also unfair competition, which seriously damages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Fair competition policy can optimize resources' allocation, improve the intensity and fairness of competition, and then caus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and competition escape effect to improve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Tak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construct the PSM-DID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model show that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average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it gradually deepen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view system.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low initial productivity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more severe impact and greater competitive pressure. It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market entities rather than production factors, so that the effect of competition escape is significant and 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s insufficient.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can improv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etition fairness by inhibiting enterprises' rent-seeking activities, breaking down local protection barriers and regulat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then cause the competition escape effect to improve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usefu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atus of fair competition policy.

Keywords: fair competi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competition escape effect;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